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一大法宝

□ 侯惠勤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是十七大部署的重大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科学发展作为根本的执政理念,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法宝。

一、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

十七大报告的第三部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是整个报告的点睛之笔,破题之解。它是我们今天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树什么形象、如何应对挑战和排除干扰、如何实现奋斗目标、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实践等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解答,是解读十七大报告的一个纲,需要着重加以领会。

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更加明确。科学发展观经过几年的贯彻落实,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十七大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更具战略性,更富理论性,更趋实践性。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原来主要是立足于国内发展大局,那么在今天则明确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要求;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原来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那么在今天则更具战略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深化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我国新的发展阶段中的指导作用。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奋斗目标,到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选择、体制机制保障以及配套政策措施,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加快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以及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到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形成了清晰而切实可行的

思路,显示了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实践力量。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形态更为完备。报告对于科学发展观原有内涵做了更为充分的阐发,例如,在阐发“以人为本”这一核心思想时,不仅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高度切入,而且明确提出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这些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观点。在阐发“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些基本要求时,在全面吸纳近年来许多新经验、新思想(如“三位一体”变“四位一体”的建设思想,“又快又好”变“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根本方向,这就是“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报告拓展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厘清了许多为人们所关注而又不很清晰的理论界限。报告在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并在原先统筹“五大关系”(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基础上,增加了统筹中央和地方、个人(局部、当前)利益和集体(整体、长远)利益、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三种关系。报告也透彻地阐发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以及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些重大理论和原则之间的关系,使科学发展观不仅成为重大指导方针,而且具有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

二、必须从世界观、方法论高度领会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必须站在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才能深刻领会。在这里,尤为重要是关于“两点”论的辩证法(两点平衡、两点互动、两点依存),关于“结合”的辩证法,关于和谐的辩证法。

我国社会目前大量存在的主要是非对抗的、人民内

部的矛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也可视为矛盾,它们确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两者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没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是盲目的,没有改革开放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僵化的;四项基本原则不变(坚持)中有变(发展),改革开放变(创新)中有不变(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就是在把握“两个基本点”的动态平衡中不断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先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能采取割断历史、片面否定的极端形式,其理论形态不能取“片面的深刻性”,而只能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结合”。把“结合”与创新对立起来,以为“结合”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方式,提出“从‘结合’到创新”一类的所谓转变,这是片面的。党的十七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包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十大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结合”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学问大得很。“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真正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国得以重新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结合”的过程,就是不断把握重大实践关系、解决重大实践课题的过程。

正是站在这一高度,才能真正把握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价值,才能真正掌握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是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新特征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新阶段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十七大报告所概括的八个方面,包括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等。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使用的是进步和问题并存的句式,充分表明这是前进中的、发展中的、进步中的问题,不能把问题作为否定改革开放的根据,不能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以往党的发展思想的否定。实际上,转变可以是纠偏性的转向,也可以是审时度势、顺势转向,我们今天讲的转变发展思路主要指的是

后者。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重视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新思路、新举措、新尝试,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转变,不是对以往发展的否定,而是在以往发展基础上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并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一谈创新、转变,就使用“从——到——”的极端化句式,防止新的片面性。

总之,十七大报告为凝聚共识、团结奋斗提供了新基础,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提供了新源泉,为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提供了新纲领,将永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上闪耀灿烂的光芒。

三、深入理解、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一法宝

十七大报告将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而载入史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阐发,是整个报告的主线。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因此,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一大法宝。

(一) 关于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的基本内涵

“法宝”是个形象的说法,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在我党历史上,使用“法宝”一词最为著名的是中国民主革命“三大法宝”的提法。毛泽东1939年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斗争历程时,首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了“三大法宝”的论断。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毛泽东是在下述两种意义上使用“法宝”一词的:其一,基本问题、基本关系的意义上。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其二,基本历史、基本经验意义上。在毛泽东看来,不断探索并学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大课题,“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

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②应该看到,毛泽东关于“法宝”的两种含义是相互关联的,它统一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

应该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关于“法宝”的用法,也就是说,解放思想是我们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基本关系、基本历程、基本经验,立足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因此这是一个第一位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解放思想”自身的特殊性,它不是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一类的具体事物,而主要是一种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因而集中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正如胡锦涛 6.25”讲话中指出的,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这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在今天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键所在。只有坚持解放思想,才能推进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和邓小平 1978 年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同,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正确的思想路线仍然是新形势下全党能否有所作为的关键,但今天的要求又有所不同。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主要为恢复作为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因而具有“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功效,那么在今天则是需要进一步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在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新特征的形势下,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因此,解放思想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 解放思想对进一步统一全党认识的特殊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思想旗帜,在这一问题上,全党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而解放思想则是深化这一认识的关节点。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是两个“统一”: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亦即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

和思想理论创新相统一,亦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破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相统一,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相统一。因此,反对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割裂,反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相割裂,就是我们所坚持的解放思想的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的两个统一,决定了它必须体现三大特征:一是客观性原则或科学性原则,二是创新性原则或先进性原则,三是人民性原则、或党性原则。就客观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浪漫主义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的道路选择,是以尊重客观实际、以是否可行、是否走得通为前提。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坚持“三不”,即基本价值不认同,基本制度不照搬,基本道路不重复,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以基本道路不重复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般都经历了先污染、再治理,先制造阶级对立、再缓和阶级矛盾,先扭曲人性、再进行人性修复的过程。如果说它们走的尽管是一条十分痛苦、代价十分巨大的弯路,然而毕竟最终还是走出来了的话,那么随着先发展国家当时的一些初始条件(如尚未出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没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强大外部压力等等)的丧失,我们如果重复照搬,必然是死路一条。

就科学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虚无主义的解构,而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实践创新。毛泽东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③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把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形同“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唤醒,把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历史主动性激发出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真实,不是任何谎言所能够颠覆的。

就党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抽象的精神自由,而是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因此,以解放思想推动的改革开放必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

改革创新的结果是国家分裂,民族解体,是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当“孙子”,那当然不叫改革创新,而只能叫自我毁灭。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尽管它必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其成果却必然不与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不是任何现成模式的翻版。仅此而言,停顿、倒退本质上是因循守旧,谈不上任何创新性,就注定它是没有出路的;而“全盘西化”即使行得通,那也不叫改革创新,而是生搬硬套、拙劣模仿,也没有以“改革开放”自居的资格。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呼应,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辟倒退。

(三) 坚持解放思想,就必须既注意排除“左”的干扰,又注意排除右的干扰

解放思想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根本问题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必然是排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干扰的过程。因此,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④今天讲解放思想,同样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样要做具体分析。今天和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时相比,“左”和右的表现都更具典型性。“左”的思潮直接指向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右的思潮则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的领导,即所谓的“一党专制”。恩格斯曾说过“两极相通”,历史一再印证了这点。“左”和右都惊人一致地把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搞资本主义,都极其相似地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之所以发生了共同的误判,就在于它们都以某种现成模式(“苏联模式”或“瑞典模式”)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情况是,“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

点。”^⑤事情很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不仅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在历史和现实中也找不到现成的模式。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在两个学习受挫(一是向西方学习走旧式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道路受挫,二是简单套用苏俄“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道路受挫)之后才成功开创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以苏为鉴”的长期探索和根本扭转“文革”错误方向的基础上才真正开创的。

“左”和右的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观和客观相脱离,集中表现在对于我国当前发展所面对的新阶段特征和挑战的把握上。“左”的思想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僵化理解出发看现状,把存在问题归结为对于社会主义的偏离;右的思想用自由化观点看现状,把存在问题归结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它们都力图根本扭转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把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加以割裂。

(四)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我们今天要走的路,从走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道路,到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都是空前的机遇与挑战,也体现了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不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矛盾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甚至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等,都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更多地总结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探索,并更为广泛地借鉴世界各国的探索,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不仅具有攻坚性质,不易突破,而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关系到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推进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不仅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

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新发展

□ 徐贵相

党的十七大从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地位、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党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的成果，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期待，使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一、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的深厚土壤在哪里呢？十七大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深入认识这个分析呢？

（一）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

的重要思想，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强调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同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此后，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重申和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其不同发展时期也会呈现不同特征。只有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正确判断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从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新世纪新阶段，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

积压式、交叉式矛盾，是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的矛盾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使矛盾具有了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未强先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奇特现象，都需要高度智慧和全局观念，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综合改革。所有这些机遇和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进一步解放思想摆在突出的位置。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都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但前者更注重振奋精神，而后者更强调尊重实际。我们今天突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保持邓小平所一再希望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一是开动脑筋、勤于思考、

破除迷信、振奋精神。二是认准方向、敢干敢闯，勇于探索、允许试验（包括允许失败）。三是尊重实践、善于总结、敢于走新路、不走大弯路。应该说，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思想保障。

注释：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第613页；第663页。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页；第235页。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本期导读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上作的报告,高瞻远瞩,思想丰富,求真务实,催人奋进,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高度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高度统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行动纲领和光辉文献。为了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七大精神,本期特别策划、编辑了“学习十七大精神”专刊,特约了中央党校、中央政研室、中国社科院、中宣部等单位专家学者的文章,从理论层面深入解读十七大精神;深圳党校系统教研人员的文章,则结合深圳实践谈学习十七大精神的体会。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特稿”特约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文章。

李君如:《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七大最大的亮点和创新就是提出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 展规律的,并且是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具有开放性特点的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这面旗帜凝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出了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团结奋斗的伟大旗帜,是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高举这面旗帜。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栏目重点推出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侯惠勤的文章。

侯惠勤:《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一大法宝》——真正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牢把握解放思想这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法宝。突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保持邓小平所一再希望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一是开动脑筋、振奋精神;二是认准方向,勇于探索;三是尊重实践、敢于走新路。这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思想保障。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栏目重点推出深圳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熊震的文章。

熊震:《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做好党的理论武装工作,在当前特别是做好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党校肩负着重要的使命。一是要通过党校的课堂(即“讲坛”)对广大干部进行系统的、持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武装工作;二是利用思想理论建设阵地(即“论坛”),组织教研人员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形成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社会实践服务。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栏目重点推出深圳市委党校刘琳教授的文章。

刘琳:《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推进特区党建事业发展》——十七大报告明确阐述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体布局和重点,这是我们党在正式文献中,第一次对新的历史阶段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重点的全面阐述,它标志着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作了创造性回答以后,我们党在自身建设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

“开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新局面”栏目重点推出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副局长白津夫的文章。

白津夫:《十七大关于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既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加快形成“三个格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优化国土开发新格局,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互相促进新格局。

“改革发展”栏目重点推出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李平的文章。

李平:《综合利用建筑垃圾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深圳实际提出:要加大对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扶持力度;从设计开始控制建筑垃圾;加强工程施工过程的监管,大力推进建筑工业化;加快研究建筑垃圾综合处理和利用技术;积极开展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项目示范;尽快制订相关法规;明确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归口管理部门。